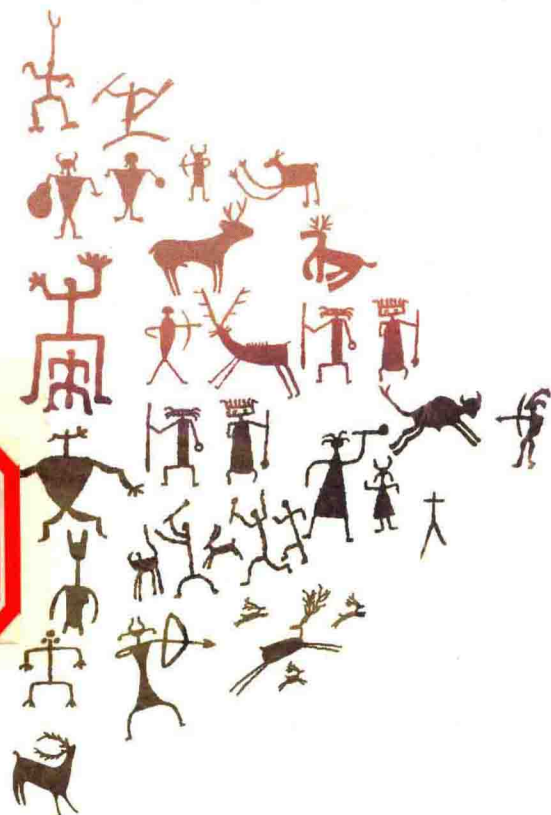


外教社跨文化交际丛书·外语教育系列

在教育与培训中 提高跨文化能力

Becoming Interculturally Competent
through Education and Training

Anwei Feng, Mike Byram, Mike Fleming 编



外教社跨文化交际丛书·外语教育系列

在教育与培训中 提高跨文化能力

Becoming Interculturally Competent
through Education and Training

Anwei Feng, Mike Byram, Mike Fleming 编

张红玲 梁文波 导读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在教育与培训中提高跨文化能力/(英)冯安伟(Feng, A.)等著;
张红玲,梁文波导读.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4

(外教社跨文化交际丛书·外语教育系列)

ISBN 978-7-5446-3506-6

I. ①在… II. ①冯… ②张… ③梁… III. ①文化交流—教
学研究—文集 IV. ①G11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62037 号

© Anwei Feng, Michael Byram and Mike Fleming 2009

This edition of *Becoming Interculturally Competent through Education and Training*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Multilingual Matters/Channel View Publications Ltd and is for sale only in the following territories: China.

Licensed for sale in China only; not for export.

本书由 Multilingual Matters/Channel View Publications Ltd 授权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

仅供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销售。

图字:09-2011-668

出版发行: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上海外国语大学内) 邮编: 200083

电 话: 021-65425300 (总机)

电子邮箱: bookinfo@sflep.com.cn

网 址: <http://www.sflep.com.cn> <http://www.sflep.com>

责任编辑: 苗 杨

印 刷: 上海华教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90×1240 1/32 印张 8.125 字数 328千字

版 次: 2014年3月第1版 2014年3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2 500 册

书 号: ISBN 978-7-5446-3506-6 / G · 1076

定 价: 27.00 元

本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向本社调换

外教社跨文化交际丛书编委会

主任

胡文仲 (北京外国语大学)

贾玉新 (哈尔滨工业大学)

副主任

Bates Hoffer (三一大学)

Nobuyuki Honna (青山学院大学)

Steve Kulich (上海外国语大学)

陈凌 (香港浸会大学)

高一虹 (北京大学)

委员

Andy Kirkpatrick (科廷大学)

Michael Byram (杜伦大学)

Michael Prosser (上海外国语大学)

Richard Wiseman (加州州立大学福勒顿分校)

Robert N. St. Clair (路易斯维尔大学)

陈国明 (罗得岛大学)

顾嘉祖 (南京师范大学)

林大津 (福建师范大学)

申惠中 (悉尼大学)

宋莉 (哈尔滨工业大学)

孙有中 (北京外国语大学)

许力生 (浙江大学)

张红玲 (上海外国语大学)

张惠晶 (伊利诺大学芝加哥分校)

庄恩平 (上海大学)

庄智象 (上海外国语大学)

总 序

跨文化交际学是一门在传播学等学科理论的基础上,与人类学、心理学、语言学、文化学以及社会学等相互交叉而发展起来的学科。其实,不同文化间的交流古已有之,但是真正将文化交流进行理论研究进而发展成“跨文化交际学”,还只是近四五十年间的事情。想要深入探究这门学科,我们首先要了解它的起源。

20世纪60年代是信息技术和交通技术高度发展的年代。随着科技的进步,空间距离大大缩短,各种文化间的交流日益频繁。但是空间距离的缩小并不意味着人们之间的文化距离或是心理距离可以瞬间缩短。与之相反的是,人们不能再用旧有的文化观念和思维方式来理解和解释日新月异的世界里出现的各种新问题。同时,文化差异滋生众多的交际失误、矛盾和冲突,反而使人们的心理距离加大。矛盾和冲突的背后不仅仅是利益或者领土的争夺,也不仅仅是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分歧,而更多的是文化和价值观念上的巨大隔阂——正是这些隔阂使“地球村”中的人们虽然身在“咫尺”之间,却有如隔天涯之感。

美国作为一个多民族、多种族的国家自然而然成为跨文化交际研究的兴起之地,其中以美国人类学家 Edward T. Hall 为代表的一些学者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跨文化交际的理论,现在学界也一致将他的著作 *The Silent Language* (Anchor Books, 1959) 当作是这一学科的奠基之作。

到了20世纪七八十年代,学者们把研究重点逐渐从对比和分析不同文化交际(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中的差异转到研究跨文化交际(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动态多变的过程中去。以此为基点,William B. Gudykunst 等一批学者建构了动态的跨文化交际理论。理论的突破带来了学科的快速发展,跨文化交际研究所涉及的学科越来越多,研究的内容更加丰富,研究方法日益科学。学科的发展引起了

世界各国学者空前广泛的关注,跨文化交际学被引进大学课堂,相关的研究学会和专业期刊相继出现,各种国际学术研讨会也定期举行。现在只要在网上简单查询一下相关书目,我们就会发现此类专著多达几百种,在刊物上发表的论文更是不胜枚举。William B. Gudykunst 曾在其著作 *Cross-cultural and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Sage Publications, 2003) 一书中总结了 15 种不同的跨文化交际理论。理论研究和探索上的巨大进步标志着跨文化交际学的学科发展日臻成熟。

进入新世纪,“地球村”每个角落的每个公民都不同程度地被卷入了经济一体化和全球化的浪潮。同时,人们清楚地意识到全球化不等于一元化。在多元文化并存的年代中,个人之间、社会全体之间、民族之间乃至国家之间,无不存在着文化差异甚至文化沟壑。培养对文化差异的敏感性,缩短文化距离,发展跨文化交际能力,已经成为新时代的迫切需求。由此,我们不难预见跨文化交际研究会 在 21 世纪被逐步推向高潮。

在关注国际学科发展趋势的同时,让我们把目光转向中国。虽然我国历史上早有注重语言与文化、语言与社会研究的传统,但是现代的跨文化交际研究在我国的起步还要追溯至 20 世纪的 80 年代。当时随着国内学界对于语言学和文化研究的不断重视,在“文化热”和“反思热”的影响下,语言研究人文化成为新的热点,这无疑为跨文化交际研究的兴起奠定了基础。改革开放扩大了国际间的学术交往,外语界的学者和教师成为国内首先接触到跨文化交际研究的一批人,他们理所当然地成为了这一学科的研究主力。我们可以这么说:20 世纪 80 年代是跨文化交际学诞生、成长和发展的关键十年。一方面,海外归来的学者把西方有关跨文化交际理论、研究方法和教学实践介绍和引进到中国;另一方面,国内研究者在学习和借鉴的同时,在继承前人成果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实际,多方位、多角度地探索和开发我国跨文化交际的学科外延,开创了初步繁荣的研究局面。

外语教师和对外汉语教师是我国跨文化交际研究领域的主力军。他们在教学的过程中认识到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应当成为外语教育的重要内容,外语教学必须与文化相结合。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末,国内一部分外语院校首先推出了跨文化交际学课程。时至今日,我国已有几十所大学的外语院系开设了这门课程。

1995 年,首届中国跨文化交际国际研讨会在哈尔滨召开,来自世界

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几百名学者进行了学术交流与探讨。中国跨文化交际研究会也在这次会议中正式成立——这标志着跨文化交际研究在中国迎来了一个新纪元。自学会成立以来,已定期组织了6次国际研讨会。同时有些院校也多次组织大型研讨会,广泛开展国内不同地区间和国际间的学术交流,跨文化交际研究得到了空前迅速的发展。

广大教师、语言学者们兼收并蓄,著书立说,撰写论文,编写教材。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出版的专著和教材多达几十本,发表的论文也有2000篇以上。他们研究和探讨的内容丰富多样,涵盖范围广泛;有些学者和教师的研究更是对西方学者的某些理论提出质疑,提出了自己的视角独特的观点。

由于学科性质所决定,跨文化交际研究比其他学科更需要不同文化间的交流。实际上,中国跨文化交际研究会已成为国际大家庭的一部分,并为推动跨文化交际研究在世界范围上的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我们的研究会中有不少教师学者同时也是国际学会会员,他们或在国际学会组织和国际学刊中承担重要工作,或是经常受邀参加在海外举行的学术会议,在会上交流论文。不少论文受到国际学界的好评,并在国际学刊上发表。我国的跨文化交际研究学者也在国外出版他们的专著,传播中国在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

回顾这20余年的学科发展,我们也应清楚地意识到前进路上存在着诸多问题。首先,在理论研究方面,正如王宗炎先生所指出的,“收集采购之功多,提炼转化之功少”,我们还没有形成具有中国文化特点的理论。William B. Gudykunst教授也曾指出亚洲学者需要创建适合自己文化的交际理论。只有学习和借鉴而没有发展和改造,没有结合自己文化特点的理论,是不可能把跨文化交际研究建成一门适合中国国情的学科的。其次,由于理论指导不足,我们的研究多集中在文化对比方面,对动态多变的交际过程的研究和探讨不够,在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上尚需要更多的探索和拓展,这些都影响了我们在这一领域的进一步发展。

在新的世纪,我们需要进一步开阔视野,发展我国的跨文化交际研究,推动此领域的学科建设,加强此领域的教学和教材建设,以满足广大教师、研究生以及各方面读者的需要。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出于推动我国跨文化交际研究的考虑,决定推出“外教社跨文化交际丛书”。丛书既引进国外权威力作,也出版我国学者的著述,还有中外专家的合力之作。

我国读者可以通过这套丛书学习和借鉴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学者的真知灼见,在领略我国学者和专家的新思维和新成果的同时,还可以欣赏各种文化交流的结晶。我们相信“外教社跨文化交际丛书”对于今后我国跨文化交际学的发展将会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在此,我们代表丛书编委会对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的大力支持表示诚挚的谢意。

胡文仲

北京外国语大学

贾玉新

哈尔滨工业大学

2006年4月

序 言

21 世纪的全球化是对教育的挑战,也为教育改革开拓了新的视域。面临这一挑战,外语,作为构建人类社会关系与和谐全球社会的重要人类社会资源,应当发挥其独特的作用。培养世界公民将是 21 世纪赋予外语教育的重要历史使命。无论我们从事何种语言教学——母语/一语、二语、外语或其他民族/族群语——实质上,无一不是全球化进程中的一部分,其目的无一不是为了培养国家/全球公民。外语教育在(全球)公民教育中有其无与伦比的、其他学科所不具备的人文价值,但目前我们很少意识到这一点。因此,外语教育政策制定者、实践者和学习者在 21 世纪正面临的挑战的确是前所未有的。

然而,我们目前的外语教学是否胜任 21 世纪所赋予的历史使命?综观外语教学现状,我们认识到应该深入发掘外语这一重要的人类社会资源,以使外语教学向全球公民教育的转变成为可能。

自 20 世纪 60 年代至今的几十年中,随着国内和国际大环境的不断变化,以及语言文化研究的逐步深入,外语教学不断应变,与时俱进,实现了以目标语语言能力为教学目标向以目标语交际能力为目标的跨越。但在 21 世纪全球化的多元文化时代,学者们开始意识到目标语的交际能力难以确保不同文化之间人们的相互沟通和理解:母语/一语的交际能力是国家价值观的标志,是国家身份(国家公民)的象征,但不同文化的人们对作为共同语的英语或其他语言的交际能力的习得能否说明他们就共享了同一套价值观,从而可使他们的跨文化交际得以顺利进行?以目的语的交际能力为目标的外语教学能否像通过母语教育培养国家公民那样培养世界公民?由于多元文化的存在,价值观、信仰之相对性的存在以及应运而生的文化、语言、社会语言、社会语用、概念相对性的存在、不同文化之间的交际远比我们所预想的复杂得多。仅以概念相对性为例:我国及其他国家英语使用者都用通用的英语单词

“citizenship”表达“公民、国民”的概念,然而,这一概念所内含的核心价值却因文化而异,我国与西方所使用的这同一概念的核心价值便相去甚远。且不谈西方国家对“citizenship”之概念在语义方面的认知差异,他们的“citizenship”价值内核大体上是“民主”框架内的人权和个性自由,而我们这一概念之内核则更加突出道德和社会责任义务,尽管两者是人类尊严的既对立又互补的不可分割的两个侧面。

近年来在交际能力基础上所构建的跨文化交际能力概念会大大促进不同文化间的交际,但促进这一能力之习得仍然难以胜任世界公民教育的重任。我们需要的是既能确保不同文化间的交际得以进行,同时又能保留不同文化之相对差异的一种跨文化交际能力,一种与全球公民概念相匹配的跨文化交际能力。

为达到培养全球公民的目标,当下外语教学所匮乏的至少有以下两个重要方面:一是确立人之作为公民的核心价值为起始点和终极目标的教育观,也就是确立人之作为人的基本道德的人文价值的教育观(the core value of a person as a human being);另一点是由于这一人文价值因时空而异,即不同文化以及不同文化在不同历史(经济、历史、政治等)发展阶段对人之作为人/公民的基本价值有不同的经历、不同的内涵、不同的解读、不同的界定。这意味着在多元文化平等共存的 21 世纪,任何文化之价值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reasonableness),这也意味着在多元文化平等共存的 21 世纪,任何文化都不能把自己对这一价值(譬如对人的基本价值)的经历、自己的文化内涵、解读和界定强加给他人。对不同文化、不同价值观(政治或宗教的)、不同生活方式,我们应当持有赞同、欣赏、理解、包容和接受的态度;但当这些方面发生冲突时,我们并不能盲目地理解或接受某些观点,而是要对它们进行理性的思辨和批评。这意味着,我们需要的是一种批判精神,而且,批判之标准有的是普适的,有的是因文化而异的,是多元的。我们所需要的是一种公认的人文价值标准,一种如费孝通先生所说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世界大同”的平等共处的人文价值观。

为配合这一发展趋势,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在“外教社跨文化交际丛书”的基础上,又引进推出一批从跨文化视角进行外语教学的权威力作。这一批以国际著名外语教育家 Michael Byram 教授为首的学者们的著作,是英国多语出版公司(Multilingual Matters LTD)出版的丛书“Languages for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and Education”(LICE)中

众多专著/文集的一部分。在这些著作中,学者们对以跨文化交际为目标的外语教学进行了开创性探索和实践,对教学理论、课堂实践和成果评估等进行了全方位的论析和阐述。他们所提出的教学目标、教学框架、能力模式、概念、理论、观点、途径、方法以及对整个教学结构的设想,不仅具有挑战性和时代的前瞻性,而且尤其可贵的是,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这些远见卓识无疑引导着当今世界外语教学改革的主流。

应特别提及的是,Byram 教授在其《从外语教育到跨文化公民教育》(*From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to Education for Intercultural Citizenship*)一书中,在原有的交际能力以及早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概念的基础上,构建了以“批判性跨文化自觉”为中心的、与世界公民相互互补的“跨文化能力”概念。这一概念创新旨在帮助实现外语教学向外语教育的转变,实现以语言能力、目标语的交际能力以及早期界定的跨文化交际能力为目标的外语教学向全球公民教育的跨越。Byram 教授的研究成果不仅在理论上为全球公民教育提供了依据,而且在实际教学实践中也有极强的可操作性,因为他把这一跨文化能力细化为具体的教学目标,使将公民教育变成课堂的教学实践成为可能。

Byram 教授及其他学者的教学经验和研究成果是在欧盟的背景中构建的,如何将他们的经验运用到我国的实际需求,需要深入结合我国特有的外语教学理论和实践框架,但其中所涉及的种种探索对我国外语教育无疑会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和参考价值,必定会引发新的思考。

感谢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为我们提供这样一套好书,为我们构建了跨文化交际的学习空间。相信本套丛书的出版会促进我国作为世界公民的外语教育的蓬勃发展。

贾玉新

哈尔滨工业大学

Preface

When the LICE series was launched just over ten years ago, we could say that it was already a commonplace to talk of globalisation and internationalisation. Our aim was to develop a series of books which would contribute in different ways to the UNESCO call that education should not only focus on the acquisition of knowledge but also on ‘learning to live together’. ‘Living together’ and ‘dialogue’ are, ten years later, frequently heard key words in policies and curricula for 21st century education, and ‘intercultural’ has gone from being an emergent concept to being part of much mainstream policy discussion and the discourse of theory and practice in education worldwide.

Language education is often sub-divided into ‘mother tongue’ or ‘first language’ (e.g. Chinese in China, German in Germany, etc.) and ‘foreign language’ (e.g. English in China, French in Germany, etc.) with a further category of ‘second language’, the official language of a country as taught to minorities (e.g. Italian taught to the German minority in northern Italy, an ‘old’ minority, or Danish taught to migrants arriving in Denmark, a ‘new’ minority, with many other examples and variations on this theme). The complexity of people’s mobility and migration which has grown so rapidly with globalisation makes such simple categories out-dated. Learners come to classrooms in formal education systems with a multiplicity of experience and, in the same classroom, the language being taught may be ‘first’ for some, ‘foreign’ for others, ‘second’ for yet others — or ‘third’ or ‘fourth’ for others again — and all this does not take into consideration the ways in which a ‘second’ language can become ‘first’ as people change their circumstances. At the same time, people learn more and more often in informal situations: immersed in multilingual environments, in front of their computer screens and the inter-

net, watching films and television in other languages on multiple channels from other countries as well as their own. In the midst of this language complexity, the questions of cultural learning and of identification with and through a language add further complexity.

The purpose of the LICE series was a decade ago, and remains today, to encourage the study of languages, cultures and identities in ways which can provide understanding of the complexity which faces us, and thereby enrich practice of learning and teaching. On the one hand the series includes books which inform the ways in which language-and-culture teaching can be structured and developed in practice. *Developing Intercultural Competence in Practice* is an example where teachers and other practitioners write about their teaching and curriculum development, and *Becoming Interculturally Competent through Education and Training* brings into one volume descriptions of practice from schools and universities and also from the world of business training. On the other hand, there are studies of the theory and history of language and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teaching which provide a firm basis on which to build practice and develop new ideas. *Language and Culture Pedagogy: From a National to an International Paradigm* traces the history of the cultural dimension in Europe and North America and argues for a perspective which goes beyond the national; *From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to Education for Intercultural Citizenship* also reviews and critiques many of the traditions of language teaching and argues that language teaching should be combined with education for citizenship.

At about the same time as the LICE series was launched in Britain, a new curriculum for English language teaching was published in China, in 2001. It referred explicitly to the importance of teaching cultural knowledge and understanding and the skills of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and had similarities as well as differences to curricula in Britain and North America (Han, 2011). Now, as the LICE series is launched in China, the Chinese curriculum has been revised and is about to be implemented in its new version. This is a recognition, as in

other countries, of the contemporary and future importance of the integration of language and intercultural learning. However we should not forget that, as in Europe and North America, the origins of reflection on the relationship of language and culture are older, and ‘can be traced in China to 1950, when a book *Language and Culture* written by Luo Changpei was published’ (Qian, 2011: 85). Developments since the 1950s, and especially since the 1980s, have been substantial and in many cases have taken note of parallel events in western countries.

What is clear to us as LICE editors is that our series has enabled scholars worldwide to find a platform for investigating, describing and reflecting upon the ways in which language teaching and learning, and intercultural education have changed in recent times. However, we are aware that it is often difficult to have access to books from other countries, especially for teachers who are constantly busy with their everyday responsibilities. We are therefore very pleased and grateful that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 through the good efforts of Professor Jia Yuxin — has decided to publish LICE books. We hope that they will contribute to the intellectual exchange with China by making available the work of the authors who have worked with us to create a range of books which meets th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needs of everyone involved in ‘language education’ of all kinds.

Michael Byram & Alison Phipps

References

- Han, Hui (2011) *An Investigation of Teachers' Perceptions of Culture Teaching in Secondary Schools in Xinjiang, China*. Lambert Academic Publishing. Also available at Durham E-Theses Online: <http://etheses.dur.ac.uk/109/>
- Qian, Lihua (2011) *Conceptions of the Role of Culture in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in China*. Unpublished PhD University of Aberdeen, UK. Available at <http://www.abdn.ac.uk/library/>

导 读

随着全球化的深入,跨区域、跨国界的教育和商务活动变得越来越频繁。在这个大背景下,跨文化能力(intercultural competence)的培养成为商业培训和高等教育共同关注的课题。为了探讨如何培养跨文化能力,英国杜伦大学组织了两场研讨会,邀请商界的跨文化培训师和学术界的跨文化研究者进行对话,本书收录的文章即是两场研讨会的结晶。这两个来自不同背景的群体虽然都关注跨文化能力的发展,但是他们在目的、方法和理念上存在差异。针对“跨文化能力是如何培养的?”这个问题,有两种极端思想:它是通过体验,通过在国外生活、旅游、结识陌生人等方式习得的;它只有通过目的明确的系统教育才能培养。这两种极端思想显然都是不可行的。另一个关于如何培养跨文化能力的争议在于教育和培训的作用。这个问题可以通过分析教育和培训的概念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来解答。

针对教育和培训两者之间的关系,教育界有两种主要的观点。在传统上,“教育”和“培训”常常被视为对立的两极:培训被认为是功利的、短视的,其根本要务无非是获得某种职业技能(Peters, 1966);而教育被认为具有更高一级的诉求,旨在培养自由、独立的思考能力,而非仅仅获得某项具体技能或有限的知识(Magee, 1971)。这种将两者二元对立的观点始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现在仍然在一些学者中具有影响力。另一种更新的观点不认为两者是孤立的两极,而是将培训视为教育的从属,认为培训为“表”(surface),是教育的这个大概概念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服务于教育这个“里”(depth)。针对这两种观点,Fleming指出,在跨文化能力培养这个具体的语境中,与其将两者二元对立或将“培训”视为“教育”的从属从而进行空泛的概念性讨论,不如将“教育”和“培训”之间的关系视为互补的辩证关系(dialectical relationship),讨论两者如何相辅相成地促成跨文化能力的培养,更具有现实意义。“教

育”和“培训”的这种辩证关系之所以存在于跨文化能力培养过程中,是因为跨文化能力的培养不仅需要学习者积累知识,培养理解力,同时也要求他们具有在社会群体中与他人交流、互动与合作的能力。从这个角度来看,教育和培训各有利弊,因为教育的过程与学术讨论和逻辑推理密切相关,培训则更多地以目标、任务和行为为导向。跨文化能力的培养所要求的体验与反思、教学、命题学习、情感投入以及引导从某个角度去看待事务等学习活动,无论是教育还是培训,都不可能全部涵盖,因此需要两者互为补充。贯穿本书各章节的一条主题线,便是对教育和培训对于跨文化能力培养的作用和实践的分析和反思。

另一条主题线,是对文化观的反思。正如 Adrian Holliday 在本书的序言中指出的那样,近年来,学者们对于文化刻板印象(stereotypes)和本质主义的文化观(essentialist models of culture)做了很多反思性的探讨。一方面,文化固性观(cultural fixity)仍然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学者们的思考;另一方面,一个新的文化视角似乎正在悄然形成,这种视角将文化固性仅仅视为一个起点,其终极目的是探究文化的复杂性(complexity)。本书几个章节都体现了一种动态(dynamic)、而非静态(static)的文化观。Gavin Jack 在第五章中指出将国家文化本质化的危险,冯安伟在第四章谈到跨文化教育时,也呼应了这个观点。实际上,多大程度上文化可以被视为民族国家特征(national characteristics),一直是有争议的。对此,Barry Tomalin 在第六章中提出的观点是:文化特质化(如将文化分为高/低语境文化、正式/非正式文化),虽然有将文化刻板化(stereotyping)的危险,但这种做法却也提供了一个具体的比较基础,对于计划前往别国进行商务活动的商人们来说,还是有其现实指导意义的。在本书对文化观的反思中,还有一条副线,对把民族国家(nation state)作为文化比较单位进行了反思。Anne Davidson-Lund 在为本书所作的序言中指出,过往的跨文化研究中,论及影响人们思维和行为的文化因素,便往往归结于民族国家的差异,而在本书所汇集的论文中,民族国家差异的解释力终于回归为:诸多影响因素中的一个潜在因素。

本书各章的作者以不同的方式试图阐释人们如何具有跨文化能力这个问题,文章的目的是去对教育和培训进行界定和辩论,而是探索在各种语境中教育和培训实施的具体过程和方法。本书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聚焦工作组织、海外营销及海外学习等不同情境下的跨

文化交际案例,分析这些语境对跨文化能力的要求。第二部分是对具体教育培训项目的介绍和反思。

第一章 当组织文化遇上民族语言文化: 求职面试的话语分析

本章作者 Celia Roberts 是英国伦敦国王学院(King's College London)教育系的应用语言学教授。Roberts 的文章聚焦于在一家英国公司参加面试的两位求职者,通过对两人面试中的话语结构及修辞运用进行话语分析,讨论导致两人面试成功/失败的因素。分析显示,相比失败的求职者,成功的求职者更加熟悉英国组织文化中的话语“游戏规则”,因此也更容易被面试者接纳为组织的一员。据此,Roberts 挑战了将文化简单地看作区别归属感(belonging)和他者性(otherness)的传统概念,指出在工作组织中,需要有两种文化视角:诉求理解、尊重、融合的民族语言文化视角和诉求统一、规范性的组织文化视角。Roberts 强调,培养工作组织中的跨文化能力,需要两个视角的融合。在文章的最后,Roberts 针对工作组织中跨文化能力的培养提出了教育和培训建议。

第二章 出口公司的多元市场经历及中小企业的跨文化范式

本章作者 Terry Mughan 是安格利亚鲁斯金大学(Anglia Ruskin University)管理学院的教授,国际跨文化教育、训练与研究协会(SI-ETAR)英国的创始主席。这篇文章建立在对东英格兰出口公司的一项实证研究的基础之上,通过对量化及质化数据的分析,考察中小企业(雇员总数 \leq 249人)在国际市场取得成功的因素。Mughan 的研究发现,将业务成功地拓展入其他市场和其他文化的中小企业,有一些共同特征:领导者/管理者倾向于受过正规的高等教育;较之其他企业有更好的外语技能;对国内外其他文化和商业环境有更广泛的接触和了解。Mughan 指出,与配备系统跨文化培训资源的大公司不同,中小企业成功的跨文化范式是由业务和市场推动的。Mughan 强调,中小企业领导者/管理者的首要任务是创造机会增加业务来维持利润和改进生产率,要理解跨文化能力的培养如何在中小企业中实现,不能脱离这一现实。